



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史实勘误之一

——关于李达是否翻译过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考辨

汪信砚

摘要：李达曾翻译过考茨基的重要著作《马克思经济学说》之说不过是一种讹传，这一讹传所依据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本身是一个无效证据；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实际翻译者为李达未曾翻译过该书提供了重要证词，而李达档案则为这一结论提供了重要佐证。关于李达曾翻译过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讹传，现在应该纠正过来了。

关键词：李达；译著；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

李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大师，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而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对外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重要论著的译介。然而，由于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李达论著和思想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人们甚至尚未完全弄清李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到底作了哪些译介和有什么译作，这突出地表现在学术界关于李达曾翻译过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广泛讹传上。本文拟对李达到底是否翻译过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问题作一勘查和考辨，以便澄清相关讹误，还原历史真相。

一、一种广泛流传的讹误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一些李达生平、论著和思想的研究者，如《李达文集》编辑组以及宋镜明、曾勉之、王炯华、丁晓强、李立志诸先生，一致认定李达曾经翻译了考茨基的重要著作《马克思经济学说》^①。其中，以王炯华先生的记述最为详细。他在其所撰《李达年表》中说，李达的这部译著是由中华书局于 1921 年 4 月出版的^②。他写道：“早在日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李达就以很快的速度翻译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高阜素之的《社会问题总览》、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著作。他是带着这三个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译稿回国的，并在中国共产党的筹建过程中陆续出版。”“《马克思经济学说》是考茨基(1854—1938)的著名马克思主义通俗著作，当时国内有好几种译文，李达的译文是第二个中译文，被李大钊领导的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

① 参见《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同志生平事略》，载《李达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宋镜明、刘捷：《李达年表(1890—1966)》，载《江汉论坛》1981 年第 3 期；宋镜明：《李达年谱》，载宋镜明著《李达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曾勉之：《李达著译目录》，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 2 辑，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2 年；曾勉之：《李达著译要录》，载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湖南党史人物传记资料选编》第 2 辑，1985 年 12 月编印；王炯华：《李达著译年表》，载王炯华著《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王炯华：《李达年表》，载王炯华等著《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 2004 年；丁晓强、李立志：《李达著述年表》，载丁晓强、李立志著《李达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年。

② 参见《李达年表》，载王炯华等：《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第 495 页。

会列为阅读文献。”^①另据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的周文婵、余昶报道,王炯华先生在谈到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译本时曾说,“这是五四马克思主义传播最早的重要著作,有三个中译本:李达本,戴季陶本,陈溥贤本。”^②近30年来,上述关于李达曾翻译过考茨基的重要著作《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说法,已被学界广为转述和引用,以致在今天看来它似乎是一种不容置疑的事实。

然而,笔者搜遍了海内外图书情报机构和各类文献数据库,结果竟一无所获,既没有找到任何能证明李达曾翻译过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有效证据或信息,也未发现任何对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李达译本的引证。以李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地位和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重要性来说,如果李达确曾翻译过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出现上述情况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同时,笔者还查阅了多种不同期号的《中华书局图书目录》,同样也没有发现中华书局出版过该书的信息。例如,《中华书局图书目录——重编第六号》(民国二十七年四月十五日编印)收录了中华书局自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创立起至该目录编印时出版的所有书目,其“社会思想与主义”和“社会问题”类目下分别载有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和《社会问题总览》的出版信息,但包括“经济学”类目在内的任何一页上都没有李达或其他任何人翻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出版信息。据此,笔者只能得出一个与上述流行的说法完全相反的结论,即根本不存在一部由李达翻译、由中华书局1921年出版的考茨基著《马克思经济学说》,李达曾翻译过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之说纯粹是一种讹传。

二、讹传之源与无效证据

李达曾翻译过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之说最初源于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2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中说:“本会现已有英文书籍四十余种,中文书籍二十余种”,其中,“社会主义丛书”部分的中文书籍之一便是“马克思经济学说(李达译)”。可以说,正是依据《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所开列的书目,人们才断言李达曾翻译了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上引王炯华先生的那段话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庄福龄先生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则说得更为明确:“《马克思经济学说》1920年3月曾被李大钊列入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阅读文献,可见此前已经出版。”^③从这些引文可以看出,人们断言李达曾翻译过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本逻辑是:既然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把“马克思经济学说(李达译)”列为其阅读书籍,那么,它必定在此前已经出版。然而,人们依据这一猜想逻辑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可靠的。且不说庄福龄先生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在弄错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刊布其阅读书目的时间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李达翻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在1920年3月前“已经出版”的断言难以成立^④,就是王炯华先生的说法也不可信,它们都与李达本人的记述不相符合。李达在写于1956年的自传中曾说:从一九一八年七月起“到一九二〇年暑期为止,我翻译过日本人所写的《社会问题总览》和荷兰人所写的《唯物观解说》(从日文重译的),后来在中华书局出版。到了一九二〇年,我自以为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了,应当回国找寻同志来干社会革命了。”^⑤从李达的记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李达在留日期间并非像王炯华先生所说的那样翻译了“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高阜素之的《社会问题总览》、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而是仅仅翻译了其中的后两部著作。而既然李达1920年8月从日本回国前并没有翻译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那么,李达自然也就不可能带着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译稿回国并将译稿交由中华书局1921年4月出版。

那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所列阅读书目中的“马克思经济学说(李达译)”又是

①王炯华等:《李达评传》,第34~35页。

②周文婵、余昶:《执着的追求 严谨的学风:记人文学院王炯华教授》,http://www.hust.edu.cn/content/content_20531.html。

③庄福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06页注。不过,该书的描述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实际上,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是“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在1921年11月才正式公开成立的(见《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和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1月17日),《马克思经济学说》被列入该会阅读书目的时间则是1922年2月(见《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6日),而不是1920年3月。

④李达是1920年8月才从日本回国的,而按照王炯华的说法,李达是带着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译稿回国的。

⑤《李达自传》,载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湖南党史人物传记资料选编》第2辑,1985年12月编印。

怎么回事呢？我认为，它一定是把“陈溥贤译”误写成了“李达译”，因为1922年2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发布前，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只有陈溥贤译本；即使是1922年以后，把考茨基的这部著作名翻译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也仅此一个译本。实际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所开列的阅读书目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形并非仅此一例。仅就其“社会主义丛书”部分的中文书目来看，也还存在着其他类似情况。例如，在“马克思经济学说（李达译）”一行的下面，隔行开列的是“社会问题详解（李季译）”，这显然也属张冠李戴之列。1922年2月以前，日本学者高畠素之的《社会问题详解》有两个中译本，即盟西译本和李达译本，但李达译本的译名是《社会问题总览》（中华书局1921年4月初版），只有盟西译本的译名为《社会问题详解》（商务印书馆1921年4月初版）。至于李季，则从未翻译过高畠素之的《社会问题详解》。因此，可以断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中的“社会问题详解（李季译）”是误把“盟西译”写成了“李季译”。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也曾注意到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的“附录二 中国社会主义书籍简介（1919—1923）”中，石川祯浩针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所开列的书目指出：“李季译：《社会问题详解》，概为盟西译之误”^①。总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曾把“马克思经济学说（李达译）”列为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的阅读书目，对于李达曾翻译过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之说而言是一个无效的证据。正如石川祯浩在考证该书中译本时并同样也是针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的书目所说的那样：“据说李达曾出过同名译作，此为讹传。”^②

三、实际翻译者的证词

我们说李达未曾翻译过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可以用考茨基这部著作的实际翻译者的考证和述说来加以证实。

考茨基这部著作的德文原名为“Karl Marx’ Ökonornische Lehren. Geme inverständlich dargestellt und erläutert”（《马克思经济学说：通俗的叙述和阐释》），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及第3卷部分内容的通俗解释，于1887年首次出版。日本学者高畠素之最初于1919年根据原书1910年版即第13版将其译成日文，并改名为《マルクス资本论解说》（《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后来，高畠素之又依据原书新版多次改译和订正，至1930年已印行72版。而自高畠素之日译《マルクス资本论解说》以后，考茨基的这部著作也开始传播到中国，并先后出现了5个中译本（其中，1949年以前有4个中译本），而不是王炯华先生所说的“三个中译本：李达本，戴季陶本，陈溥贤本”。

一是陈溥贤译本（《马克思经济学说》，柯资基著，陈溥贤译，商务印书馆1920年9月初版）。陈溥贤是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最早中译者。他依据高畠素之的卖文社出版部1919年版日译本，最初将这部著作翻译为《马氏资本论释义》，并以“渊泉”为笔名发表于1919年6月2日至11月11日的北京《晨报》副刊“马克思研究”专栏。在对译稿进行修订的基础上，陈溥贤于翌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单行本，译名依其德文原名改为《马克思经济学说》，属共学社“马克思研究丛书”之一种。不过，该书出版前，同属共学社“马克思研究丛书”的《社会问题详解》（高畠素之著，盟西译，商务印书馆1921年4月初版）的扉页上及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17卷14号（1920年7月）都曾登载过该书的出版预告，称柯祖基著、渊泉译注的《资本论解说》将于近期出版，这说明译者开始曾准备仍沿用日译本书名，读者不应由此误以为后来出版的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中译本《资本论解说》系渊泉即陈溥贤所译。

二是戴季陶、胡汉民译本（《资本论解说》，考茨基著，戴季陶译、胡汉民补译，上海民智书局1927年）。曾经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想要用一番切实研究功夫”的戴季陶，也曾试图转译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高畠素之日译本，并于1919年11月至1920年12月间在上海《建设》杂志第1卷4—6号、第2卷2—3号、5号及第3卷1号上发表了其译作《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加尔·考茨基著，戴溥贤译），但并未译完原书。直到1927年，经过胡汉民的补译和修订，该译作才得以完成，并改书名为《资本

^① 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50页。

^② 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346页。

论解说》正式出版。胡汉民在该书“序二”中对他所作的补译和修订及其原因作了说明:“戴季陶先生于一九一九年译此书陆续登过《建设》杂志,季陶先生译笔之精当,可以无须我来介绍。不过到《建设》第三卷第一号为止,译到第三篇第四章,以后《建设》停版,也未见季陶先生续译,我觉得它未成完璧,甚是可恨,所以替他补译以下的三章。又季陶先生所据高阜氏日译初版(这日译初版也销售了一万三千五百部)是依原书第十三版的(一九一〇年版),而高阜氏前年再版,就依原书第十九版(一九二〇年版),有多少修改……,现在我也一一补上。还有《建设》杂志所登错字很多,只有对勘日文译本,替他更正。”^①

三是汪馥泉译本(《马克思底经济学说》,考茨基著,汪馥泉译,神州国光社1930年5月版)。汪馥泉为该书写了一篇很长的“译者序言”,它对于我们的考证来说十分重要。他写道:

本书,如前所述,是一部《资本论》解说书。这一类的著作,很不少;现在就译成中文的,我所知道的,最重要的几部,列下。

一 罗撒·卢森堡著《新经济学》,陈缓孙译。

二 波洽特著《资本论解说》,李云译。“被上海大学一班人译成了中文刊行”的现在已绝版的博洽德著《通俗资本论》,与本书,为同一书。

三 河上肇著《经济学大纲》,陈豹隐译。

四 河上肇著《资本论入门》第一卷上册,刘楚平译。

五 英国平民联盟编纂《经济学概论》,丁振一译。

六 本书。本书连这个译本,一共有三个译本(关于这,后面还有一段话要讲到)。

1 《资本论解说》,戴季陶译。

2 《马克思经济学说》,陈溥贤译。

3 《马克思底经济学说》,汪馥泉译。^②

上述引文中,汪馥泉说关于他所译的这本书“后面还有一段话要讲到”。这“一段话”的主要内容是:

本书底中译,除这个本子之外,有前举的戴译与陈译。

戴季陶先生于一九一九年,根据日译初版译,陆续译登《建设》上;一九二七年胡汉民先生补译第三篇第四章以后的三章,并根据日译改译版(即大化会及Atene社版)补正了三处,作单行本刊行。

陈溥贤先生于一九一九年,根据日译初译版,陆续译登北京《晨报》,一九二〇年作单行本刊行。

我底重译此书,第一,是友人陈望道先生好几次说起,因为这书底日译改造社版已大加改正,鼓励我可以用点力重译一道;第二,我正想仔细地阅读这一类的书,读一道不如译一道更其来得仔细;第三,这般的著作,在现在的中国读书界,觉得还是能够有点益处的;所以译了。

这本书底翻译,自己觉得很谨慎,但误译总也难免。如戴季陶先生底译本,也难免间有误译(《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张瞿先生指摘戴译底误译,列举十二处,其中,二,三,六至十,十二等八处,是戴氏误译的;又十一,戴张两先生都误译了的,照张先生底译文,好像考茨基站在资本家方面了;又四,张先生译文虽似较好,但日译本原文是如此;又一,五,戴张译文同。张先生所举外,戴译尚有数处误译了的。陈先生译本,误译较多)。

这译本,承友人陈望道先生于忙碌中,校阅一道,特此道谢!^③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了汪馥泉译考茨基《马克思底经济学说》时所写的“译者序言”中的大段文字,是要表明: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著名的进步思想家、翻译家和编辑出版家,汪馥泉在1930年翻译考茨基的《马克思底经济学说》时十分熟悉此前国外《资本论》解说类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情况,也非常清楚他所译这部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历史及已有译本中存在的问题,因而他的记述是完全

①考茨基:《资本论解说》,上海民智书局1927年,“序二”第5~6页。

②考茨基:《马克思底经济学说》,神州国光社1930年,“译者序言”第XVII页。

③考茨基:《马克思底经济学说》,“译者序言”第XXV-XXVI页。

可信的：此前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只有陈溥贤译本和戴季陶、胡汉民译本，并不存在李达译本。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猜想说汪馥泉并不熟悉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工作，因为在上述“译者序言”的开头部分，汪馥泉在谈到日本学者河上肇的著作《资本论入门》时就提到过李达的一项翻译计划。他写道：河上氏的“《资本论入门》第一卷上册（到现在，只出版了这一册），中文已有刘楚平先生译本，惜误译不少，但也不妨拿来参考（据说李达先生拟重译）”^①。汪馥泉写上述“译者序言”时对李达计划中的翻译工作都一清二楚，不可能不知道李达已经做过的、与他自己正在做的译事本质相关的重要翻译工作。况且，汪馥泉是经“友人陈望道先生好几次说起”并在陈望道的“鼓励”下才翻译考茨基《马克思底经济学说》的，译本还曾由陈望道“校阅一道”。倘若李达曾经翻译过考茨基的同一著作，即使汪馥泉不知情，作为《共产党宣言》的首译者并与李达有长期密切交往的陈望道是不会不知道的。

顺便指出，神州国光社 1930 年 6 月出版了一部由洪涛翻译的《资本论概要》，该书是日本学者石川准十郎对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改编，石川准十郎“不但将考茨基所遗漏的《资本论》第二卷的内容补进去了，并且有许多部分是直接引用《资本论》的原文来说明的”^②，故该书署名为“考茨基原著，石川准十郎译述，洪涛重译”，可以说是与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密切相关但又有所不同的另一部著作的译本。值得注意的是，洪涛在“译者序”中申述该书与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关系时指出：“此书（指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引者注）在我国共有两种译本，一种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久已绝版，另一种是由民智书局出版的，戴季陶胡汉民两先生共译，题名为《资本论解说》。”^③洪涛这段话，同样也否定了李达曾翻译过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当然，严格说来，洪涛的说法也有不准确之处，因为他遗漏了一个重要事实，即 1930 年 6 月他翻译的《资本论概要》出版前，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除他所说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溥贤译本和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戴季陶、胡汉民译本外，还有上述汪馥泉译本。不过，汪馥泉译本是 1930 年 5 月出版的，而洪涛翻译的《资本论概要》是 1930 年 6 月出版的，考虑到图书出版至少需要几个月的周期，洪涛写作“译者译”时不知道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还有一个汪馥泉译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此外，还有铎梅译本（《马克思底经济学说》考茨基著，铎梅译，社会科学研究社 1949 年 4 月）和区维译本（《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考茨基著，区维译，三联书店 1958 年 2 月）。因这两译本与我们的考证关系不大，故这里不作详述。

这就是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一书在中国的翻译史。其中，汪馥泉、洪涛两人的考证和述说为李达未曾翻译过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提供了重要证词。

四、李达档案的佐证

笔者曾通览了武汉大学档案馆里现存的李达档案，目的在于从中寻找李达是否曾翻译过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些微线索。从 1953 年 2 月就任武汉大学校长，到 1966 年 8 月被迫害致死，李达曾在武汉大学工作 13 年之久。但是，由于各种极其复杂的原因，武汉大学档案馆现存的李达档案残缺不全，只有 1963 年以后的部分资料，此前近十年的李达档案全然不见踪影。不过，即使仅凭这些极其有限的李达档案材料，我们也仍然能够得出李达未曾翻译过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结论。

首先，现存李达档案中有关李达论著及其目录的材料从正面支持了这一结论。武汉大学档案馆现存李达档案中有一袋档案标注为《李达著述目录》^④，内含“李达著述讲话目录”、“李达同志部分著作的目录（手稿和剪报）”、“装箱运京书籍清单”、“李达著作目录（初稿）”四份材料。这四份书目编写于“文革”前的 1963 年至 1965 年，那时李达尚在人世，并且部分书目属于图书实物的清单，因而是具有可信性

①考茨基：《马克思底经济学说》，“译者序言”第 XXV-XXVI 页。后来李达等译的河上肇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上海昆仑书店 1930 年），下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即河上肇先前出版的《资本论入门》一书的内容——引者注。

②考茨基原著、石川准十郎译述：《资本论概要》，神州国光社 1930 年，“译者序”第 1 页。

③考茨基原著、石川准十郎译述：《资本论概要》，“译者序”第 1 页。

④《李达著述目录》，武汉大学档案馆，档号 RW75 1966-3。

的。虽然这四份书目中的每一份均未尽数列出李达的所有论著,但如果把它们合并起来看并参照李达档案中其他有关李达论著的材料,我们仍可列出一份人们所熟知的李达译著的完整目录,包括日本高畠素之的《社会问题总览》、荷兰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日本堺利彦的《女性中心说》、日本安部矶雄的《产儿制限论》、日本高柳松一郎的《中国关税制度论》、日本穗积重远的《法理学大纲》、日本山川菊荣的《妇女问题与妇女运动》、日本杉山荣的《社会科学概论》、德国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日本河西太一郎的《农业问题之理论》、俄国米哈列夫斯基的《经济学入门》、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苏联卢波尔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日本河田嗣郎的《土地经济论》、俄国拉比拉斯等人的《政治经济学教程》、苏联爱森堡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①。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份书目中均没有出现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李达档案中其他有关李达论著的材料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关于李达曾翻译过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信息。

其次,现存李达档案中的李达批判材料从反面支持了这一结论。1966年6月李达被打成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帮头目”后,造反派们编造并在报刊上发表了铺天盖地的李达批判材料,给李达罗织了各种罪名,如“大地主”、“大叛徒”、“漏网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毛泽东思想的死敌”、“老牌的机会主义分子”、“帝国主义的辩护士”、“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老修正主义分子”、“反对建立共产党的吹鼓手”等等。为了论证这些罪名,造反派们纷纷炮制李达“罪恶的历史”和“反动言论汇编”,并由此盯上了李达不同时期的论著。他们断章取义地从李达的著作、论文甚至译著中摘取只言片语并加以歪曲,用以证明李达“一向反动”。例如,一份署名为“武汉大学钢二司三司革联红教工、武汉大学革命到底串联会”的《李达大事记(1890—1949)》中写道:李达“1920年8月从日本回到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混在一起,在报刊上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文章,如‘劳工神圣颂’、‘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马克思还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章”,它们“诬蔑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如说“考茨基、伯恩斯坦是‘马克思派’”),“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颂扬‘自发论’,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表明李达从来就不是一个‘老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牌机会主义者’”^②。如果李达果真翻译过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造反派们是决不会放过颠倒黑白地把李达与考茨基的机会主义错误牵扯在一起的绝佳机会的。但是,笔者翻遍了这些侥幸保存下来的李达批判材料^③,并没有发现有谁“揭发”过李达曾翻译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或用它来论证李达是一位“老牌机会主义者”。

综上所述,人们断言李达曾翻译过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证据是不成立的,而无论是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实际翻译者的证词,还是李达档案所显示出来的信息,都表明李达未曾翻译过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关于李达曾翻译过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讹传,现在应该纠正过来了。

●作者简介:汪信砚,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湖北 武汉 43007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0&ZD062)

●责任编辑:涂文迁

①这份清单仅包括以单行本刊行的李达译著,不包括李达发表在报刊上的译作,如《德国劳动党纲领栏外批评》(即马克思著《哥达纲领批判》)等等。

②武汉大学钢二司三司革联红教工、武汉大学革命到底串联会:《李达大事记(1890—1940)》,武汉大学档案馆,档号RW75 1968-7。

③“文革”后期武汉大学李达“三家村”冤案平反前,一些曾经策划、制造李达“三家村”冤案并仍身居要位的人曾指示武汉大学销毁李达“三家村”冤案的全部材料,但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些材料并没有被销毁。这些侥幸保存下来的宝贵材料,使后人得以了解武汉大学李达“三家村”冤案的真相。